

# 媒體災難敘事的社會意義建構： 日本福島核災的戲劇分析\*

齊偉先

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副教授

現代人對災難的理解相當程度依賴大眾媒體的敘事報導，因此大眾媒體的災難報導影響了相關的社會溝通模式及內涵，也影響著民眾面對災難的態度。就這意義而言，媒體的災難敘事不僅只是訊息的告知，更是建構災難之意義圖像的社會行動。此外，媒體敘事也引發許多其他的社會行動，如民間團體及民眾捐款活動等，這些活動反過來創造出更多的敘事題材。針對這個有高度自反性的多元敘事報導，戲劇理論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觀察切入點，讓我們看到現代社會面對災難時是如何建構災難圖像，又如何溝通出因應之道。本研究以二〇一一年日本福島核災為例，透過分析臺灣平面媒體對此災變的報導，指出媒體相關的多元敘事交織出一齣戲劇，並應用戲劇理論說明臺灣如何建構一個發生於他處的災難圖像並賦予其社會意義。分析顯示，災難是現代社會中少數能透過媒體激發出集體「共在感」的重要因素。並且研究也由災難敘事的戲劇分析進一步說明現代媒體自身也可能是一種製造風險來源的理由。

**關鍵詞：**災難、敘事、戲劇分析、福島核災、大眾媒體

---

\* 感謝兩位審查人給予許多建設性的修改意見，讓本論文的討論能更臻完善。另外黃瑋玲助理辛苦地進行校對與訂正工作，謹此一併致謝。

## 壹、災難的媒體再現

自然災難在現代一般的理解中，指的主要是物質環境發生了非預期的大規模破壞，但人類社會並非自古以來就一直存在著現代人所認知的「自然／文化」這組差異概念，許多初民社會對天災的理解，往往就內含有文化反思的意涵，例如天災可能被解讀為道德敗壞的象徵。這種具高度特殊文化內涵的詮釋在現代並非完全消逝，只是未必有當代正當性而容易被淹沒在其他多元聲音之中。現代人在「自然／文化」的差異思維架構下，雖對自然災難進行了去文化內涵的科學詮釋，但作為自然現象的「災難」，它在現代社會的詮釋中都必須經歷某種程度的社會溝通過程，使其被理解及認知為一個「事件」，也就是說社會溝通中的「災難事件」並不只是「自然災難」，還包括了社會溝通機制所進行的敘事建構，亦即將自然災難事件化的過程。這種將災難敘事化為「事件」的過程是現代社會中對「災難」進行理解的重要再現機制，但現代社會對災難的詮釋頗為多元，許多不同詮釋同時並存：例如宗教團體仍繼續將災難事件與宗教意義連結；「預言達人」也將災難納含入其預言體系中；而科學專家則倚賴科學知識來生產對災難的理解及處理方式。在這多元的再現機制中，其中有一項特殊的詮釋機制充分反應了大眾對災難的感知，亦即大眾媒體這個再現的敘事機制。

媒體這個再現機制的特殊性在於，它在現代社會中創造了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所說的「擬像的真實」（Baudrillard, 1994）。它的「真實」效應在於它影響、甚至決定了社會溝通的模式及內涵，例如在政治溝通中媒體效應的「真實性」就特別鮮明：許多媒體研究都指出，現代媒體的出現關鍵地轉變了政治過程的特質，一些與公共事務有關的政治操作都隨著媒體特性的轉變而改變，

例如 Meyer (2002) 就曾指出在現代媒體環境中，政黨在政治溝通中的角色有所改變，政黨不再是政治溝通中扮演中介機制的最重要角色，政治操作模式也因而發展得更要有即時性 (presentism) (Meyer, 2002: 108-111)；另外，政治人物個人特質的影響力隨著媒體政治的發展也變得比以往重要 (Louw, 2005: 128)；地方性的認同建構也因媒體政治的效應而逐漸凌駕於國家認同之上 (Louw, 2005: 129; Scammell, 2003: 122-123)。除了政治領域之外，其他領域的社會溝通也同樣隨著媒體特性的變遷而以新的模式進行著，以災難為例，相對於少數當事人的「親身經歷」，多數人所瞭解的災難面貌相當程度都依賴新聞媒體所生產的敘事報導。媒體在建構「事件」的同時，也「真實地」促成了許多社會溝通，特別是那些與公共事務有關的「事件」更是如此，災難事件就是其中的一個代表典型。災難事件的報導涉及了災難作為一種公共事件的建構，與大眾的公共感知直接相關，因此往往會引發社會中多元社群分別生產不同的論述來因應。就這意義而言，媒體中的災難敘事是討論一個社會如何建構災難圖像相當重要的基礎。

由於媒體類別相當多元，本文的討論無法涵蓋各種不同媒體類型的報導，因此本研究策略性地以平面媒體對二〇一一年日本福島核災的報導為例，探討媒體中災難敘事的再現機制如何創造意義文本及建構災難圖像，進而影響閱聽眾的內在意義建構。此外，由於不同的社會對同一災難事件的再現角度不同，而由此所派生的社會效應也有差異，因此在研究策略上，本文將研究範圍僅限縮於臺灣社會，並以大眾媒體這個透過生產文本來建構「事件」及生產相關意義架構的場域為主要探討的範圍，以臺灣媒體的再現文本為本研究資料分析的主要基礎，因而討論中將不涉及日本媒體的報導及其在日本社會內部所產生的社會效應。

## 貳、敘事作為「文本」vs 敘事作為一種 「社會溝通的活動」

社會溝通中的一個「事件」必須藉由一定的敘事結構來被呈現，不論它是歷史事件或正在發生中的事件。一個敘事結構本身就是一種具文化性的建構，有關這點法國人類學家李維史陀（Lévi-Strauss）有非常深刻的刻劃：李維史陀以神話為例，說明神話（作為一種敘事結構）反映有傳頌此神話之族群的心靈思維結構（Lévi-Strauss, 1991: 137-143; 2001: 36-48）。他甚至進一步將神話的角色對比於現代的歷史敘事及小說文類，認為這些文類有著如同過去神話的地位（Lévi-Strauss, 2001: 62-74）。這個結構主義觀點相當具啟發性，引導我們重新檢視現代媒體中報導文本所內含的意義向度。但由於李維史陀異中求同的研究進路涉及了一些本質性的預設，許多學者針對此點指出了他的進路與新康德主義之間的關聯，檢討了他所持普遍性預設的限制（Doja, 2008）。這個本質性預設讓他相信同一文化中的不同敘事文本中潛藏有個共同的文化思維結構，甚至將此立場擴大延伸至跨社會的討論，他認為不同社會中的敘事文本都內含有某種人類普遍共享的基本思維結構。這樣異中求同的取徑所探討的敘事文本可算是一種對超敘事性文本（metanarrative）的探索（Somers and Gibson, 1994），如同李歐塔（Jean-François Lyotard）所說的「大敘事（grand narratives）」的生產（Lyotard, 1984）。

自李歐塔以「大敘事」的終結作為標示後現代的特徵以來，敘事研究開始走向微觀個體認同研究的層次，其中的轉變不僅只是由歷史鉅觀朝個體微觀轉進的進路移轉，這個轉變所代表的是更深層之基本立場的質變：個體敘事的研究強調去本質化、突顯個體詮釋及建構個體主動性的動態過程，如同 Somers and Gibson 所說「個

體的認同並不是導源於社會發展階段（如前工業化階段或現代化階段）所內含的特徵，或源於不同社會範疇（如傳統工匠、工廠勞工、或勞工階層的妻子）所決定的『經驗』，而是源自行動者鑲嵌於、以及認同於什麼樣多元（往往也是相互競爭）之象徵性敘事或物質性敘事的位置」（Somers and Gibson, 1994: 76）。也就是說這類後現代式的認同研究，強調的不是源於社會特徵（如社會階層、社會範疇）所產生的認同，而是在不同社會論述基礎上，探討個體如何進行詮釋、選擇、尋求自處之道的一種存在式（ontological）的認同定位，因此它的內涵是一種個體的「存在式敘事（ontological narrative）」（Somers and Gibson, 1994: 68），具有敘事的偶發性（narrative contingency）這個建構特質（Davis, 1991）。

這類認同研究之存在式敘事的呈現模式，基本上是獨白式的自我對話、自我辯證及經歷述說（Riessman, 1993），但個體自處之道的自我對話卻無法跳脫於社會中既存的多元敘事結構之外來進行，也因此 Somers and Gibson 在建構存在式敘事研究架構的討論中，不得不提出另一種「公共敘事（public narrative）」的類別來輔助說明（Somers and Gibson, 1994: 62）。所謂「公共敘事」也就是社會團體及文化制度中所生產的、穩定性較高的敘事文類，這類文本是個體進行存在式敘事的重要參照、對話基礎。由於 Somers and Gibson 主要闡述的是「存在式敘事」，關心的是個體認同與敘事之間的關係，因此他們在概念的建構上是將「公共敘事」理解為附屬、次要的，視「公共敘事」為個體生產存有認同過程中必須與之進行對話的工具性擺設。

雖說敘事研究曾經歷上述轉向：反省李歐塔所謂的「大敘事」轉而發展出與個體認同有關的「存有式敘事」，但這轉向中「去聽眾脈絡」的特質卻保存不變，也就是說這兩種敘事邏輯，都認為敘

事文本的內涵及價值不會因聽眾的不同而有所改變，或者也可反過來說：它是為所有可能讀者而生產的一種敘事文本，因而不僅有「真實性（reality）」，並且還保存有一種「真理（truth）」式的言說特質。即使一個「存有式敘事」（作為一個文本）在內容是相當殊別、相當個人化而沒有普遍性，但在進行自我對話、自我辯證的經歷述說時，其言說態度被預設為是不鎖定任何特定聽眾或讀者的。因此即使個體認同的敘事研究看到由集體性敘事轉向個體性敘事的重要性（Taylor, 1989: 39），但仍一直秉持「去聽眾脈絡」的基調，相信「去聽眾脈絡」的敘事生產是可能存在，而且正因如此才具研究意義及價值。這樣的看法其實忽略了敘事（作為一種社會溝通活動）發生的社會脈絡，也因此忽略了考慮聽眾脈絡的「敘事活動」本身。

西文的「敘事（narrative）」這個名詞乃源於動詞「敘說（narrate）」，意即告知、述說（to tell），因此活動的互動及溝通性以及對象針對性十分關鍵，可說「敘事」此詞的原意就包含有溝通的指向性。Bruner（1986: 145）在論及「敘事」一詞時，也曾指出「敘事」所內含的三個重要元素，亦即故事（story）、論述（discourse）以及述說（telling）：「故事」指涉敘事的內容是由一連串的事件（events）所構成的具時序發展邏輯性的結構關聯，其中包含有一定的文化思維邏輯，如同李維史陀所稱的文本結構；至於「論述」則是強調在文本結構之外，敘事所內含的權力特質：因為所有敘事都是在既有制度化及組織化的公共敘事基礎上所發展出來的，而這個公共性基礎本身就內含有一種社會中既存正當性的權力意涵，因此可以說所有敘事都隱含著既存正當化基礎的權力成分；而最後一項「述說」元素則是強調敘事本身是一種有對象針對性的社會溝通活動，因此進行敘事分析時，必須考慮溝通的對象針對性所產生的影

響。最後這項元素「述說 (to tell)」突顯了前述「大敘事」及「存有式敘事」因去聽眾脈絡的基調所忽略的面向。在考慮述說這項元素所強調的對象針對性後，我們發現前述「大敘事」及「存有式敘事」只是眾多敘事類別中的一種特殊類別，其共同具有的特殊性在於其溝通的指向是所有可能的個體，也可說它們都是標舉無溝通對象針對性的特殊敘事類別。但社會中存在著更多極具對象針對性的敘事文本，如新聞媒體的敘事文本。因此針對這類敘事文本的分析則必須將之放在社會溝通的脈絡中來討論。以下的戲劇理論提供了我們一些思考的啟發。

### 參、由「敘事」到「戲劇」： 戲劇概念引入的必要性

維多·特納 (Victor Turner) (1966) 曾提出「儀式過程」的概念，說明儀式活動中反結構 (anti-structure) 的特性，挑戰了將儀式理解為固定結構流程的看法，強調它是一個具有再結構化特質的社會過程，這項反省與前述「存有式敘事」對「大敘事」的反動批判相當雷同。但他後來更進一步提出社會戲劇 (social drama) 的概念，說明社會中外顯的「劇」是內部隱在的儀式過程的外在表現，「劇」與「儀式」這兩者共同展現出一個滿足人們建構「共在 (感) 社群 (communitas)」需求的整體機制 (Turner, 1982: 73)。由儀式到戲劇，特納發現動態感不只是時間面向的動態「過程 (process)」，更是社會面向的動態「展演 (performance)」 (Schieffelin, 1998)。動態互動的社會性是他所要強調的戲劇特質，並且這社會性是在許多偶發狀況下展演建構的：他認為具反結構特質的社會戲劇是社群在面對偶發、非常態的狀況時，經歷「斷裂 (breach) — 危機 (crisis) — 修正調整行動 (redressive action) — 再

整合 (reintegration)」一系列四階段劇碼的整個歷程 (Turner, 1974: 38-42)。

筆者將特納的儀式與戲劇關係，做以下的詮釋說明：特納的儀式概念指涉參與其中之演員社群進入展演情境的整體歷程，因此「儀式過程」強調的是這個演員社群透過一些流程性互動在社會中進行社群定位的社會過程；而「戲劇」則是強調這群演員社群在共同展演過程中，與社會環境中的其他「觀眾」之間所發生的觀演互動關係，因此當特納強調結構性的再整合時，談的是演員（社群）與觀眾（社群）之間發展出共在感的過程。儀式有如演員行動的展演流程，展演出劇情結構，但他們的演出不時地會隨著觀眾的反應而調整，讓演員社群在儀式性的演出後獲得觀眾的重新認可，獲得他們在社會整體中存在的正當性。循此思維，整齣戲劇的展演在建構意義上無異於是演員與觀眾的「共在展演」。儀式是戲劇的重要元素，但戲劇不只是儀式，戲劇指涉的是儀式展演背後，演員與觀眾共同進行意義建構的這個社會活動整體 (Hastrup, 1998)。這與前述說明敘事文本必須被放在社會溝通的脈絡中而非視為獨立文本來研究的立場不謀而合。這反省啟發了我們用戲劇理論來含納敘事分析的看法：敘事類比於特納的儀式，代表的是一種展演行動、是構成戲劇的重要元素，但戲劇不只是敘事，戲劇在本文指涉的是多元敘事活動的展演背後所發生的意義建構整體，這為參與其中的敘事展演者與閱聽者之間創造了一種「共在感」。

媒體圍繞著自然突發的變異現象生產出多元的「災難敘事」，針對不同的閱聽眾進行不同的敘事展演，這些媒體中多元「再現的災難敘事」，依循著上述的理論反省可被視為是戲劇中片斷的劇碼，是一種要求被閱聽、再生產的文本類型，因此筆者認為戲劇理論提供了本文一個不錯的參考基礎。當然，現代社會中存在著

更多由閱聽眾個體所生產的認同敘事，如同許多現代媒體研究強調閱聽眾的主動性（Storey, 2003），突顯差異化及閱聽眾個別詮釋的重要性。但本研究之所以並不直接處理閱聽眾自我認同的詮釋敘事，原因在於本文著重戲劇的形構本身，筆者認為媒體中的再現敘事是針對閱聽眾所進行的敘事展演，這些展演行動所構成的劇碼反映的是敘事生產者在考量閱聽眾這項因素後所產出的展演行動，所以媒體再現敘事所構成的劇碼可被視為是「敘事演員」與「閱聽觀眾」共構產生出來的，有著特納所稱的「共在社群」建構的內涵。為了分析媒體再現的劇碼，筆者參考了劇場理論的觀點，分別從希臘悲劇及貝爾陀·布雷希特（Bertold Brecht）的史敘戲劇（*das epische Theater*）理論，找到了一些實際分析可參酌的基本架構，析論如下。

亞里斯多德在《詩論》中勾勒出了古希臘時期悲劇理論的輪廓，他對悲劇這種藝術形式進行了以下的說明：「悲劇是一種對良好及完美行為的模仿（擬情）……不是透過陳述，而是透過苦痛（*eleos*）、驚懼（*phobos*），來達成這些激昂情感的昇華淨化（*pathēmatōn katharsin*）」（Aristotle, 1920）。其中的「苦痛、驚懼」是以觀者感官為核心所具體產生出的效果，而悲劇之所以能進一步產生觀者「情感的昇華淨化」的效果，依賴的是情節安排所表彰的意義向度，可以說，苦痛、驚懼只是引發觀眾產生悲嘆、「天問」的情緒，而戲劇情節所導引安排排解此情緒的可能方向與「出口」才是讓觀眾內在產生昇華淨化的關鍵。他進一步說明一齣悲劇必然需要有以下三個結構元素：轉折（劇情開始變調之處、開始預見悲劇的轉折點）、辨認（悲劇最高潮的發展）、苦難（悲劇高潮之後的消化喬段），其中苦難就是指出消化情緒、給予觀者內在生產意義方向感最重要的部分。

而二十世紀德國社會批判劇作家布雷希特的敘史式戲劇理論則提出了另一種值得參考的觀點，他曾參照中國京戲的舞臺技巧，主張應在劇中製造疏離化效果（*Verfremdungseffekt*）來讓觀眾在觀賞時能採取較為客觀的態度，如此一來，觀眾才能對戲劇中所處理的主題採取批判的角度來進行反省。例如安排演員朝觀眾說話，或安排類似說書旁白的角色穿插其間，提醒觀眾作為一個外於劇中角色的第三者身分，促使觀眾能採取一種客觀的態度來觀察及反省上演的主題。這樣的戲劇理論並不期許觀眾過於涉入劇中角色的情緒，相反的，乃試圖引導觀眾以客觀的角度來反省劇情結構所烘托的矛盾及社會關係（鄭芳雄，2005: 43-53）。這樣的劇種往往是以寓言劇的形式展現，試圖呈現一種「道理」、一種意義結構，因此每個角色常被設計成是符合戲劇結構需求的功能性角色，而非一個充滿複雜多元性格、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因此這類劇種對角色心理特性的探討較少。

社會中所發生的真實災難雖不是劇，但在「敘事結構」的再現建構層次上卻有與戲劇相近的特性，媒體報導作為一種敘事文本，雖是鑲嵌在制度化經營的考量之上，但它也同時有意義建構的色彩，透過訊息的編排可以鋪陳出一定的敘事結構，連帶促成閱聽眾進行意義的反省，如同前述的兩種戲劇理論都提到戲劇與觀眾的內在意義生產有關。因此這些戲劇理論所彰顯的觀點，對我們討論災難媒體再現的敘事結構可以有相當多的啟發。

## 肆、媒體災難敘事文本的戲劇意涵

一個事件之所以能透過媒體敘事發展成為「社會事件」，必然有其引發社會效應的基礎，而這個引發社會效應的基礎就是各個敘

事在被生產過程中必然會參考並與之對話的重要基石。由同一事件所發展出來的敘事儘管多元甚至相對立，但這基石卻是它們共享的發展基礎。以災難事件來說，就如同特納所說的「斷裂」元素，它產生了對既存具正當性的規範的破壞，因此使得災難事件成為多方關注的、具社會效應的事件：災難無疑會造成生活常態及生活秩序及相關規範的破壞，而這生活秩序（包括經濟秩序、行政秩序等）由於是共享的，因而使得災難能引起一般大眾的關注而發展成為具社會效應的事件。因此儘管媒體的災難敘事訊息多元、立場紛異，但背後能使其產生社會效應的基礎卻是共同的。基於這個觀點，本研究並不試圖針對某個或某類災難報導的立場及內容進行主題式的分析討論，本文認為透過戲劇分析反而可以涵蓋多元的敘事類別進而處理媒體所建構的災難事件之所以能引發社會效應的理由，這理由涉及的就是隱身於事件背後的公共性。

媒體災難敘事中，常出現與災難之公共性格有關的敘事，也就是要讓敘事文本能提供閱聽眾一種與己相關的切入點。若參考上述戲劇理論觀點中引發驚懼感受及創造疏離化客觀效果這兩個判準，則可分別將敘事文本進行一種意義向度的分類：一種是建構閱聽眾對災難有「切身感受」的敘事模式類型，使得災難報導成為一種與閱聽者自身相關的敘事文本，閱聽眾因而很容易找到與之對話的切入點；另一種方式則是客觀地鋪陳出災難背後所涉及的公共性論述，讓閱聽眾認知此事件與己相關。分別舉例說明如下：

## 一、引發驚懼感受的敘事類型

這類描述特別著重在災難慘狀的敘事報導，常配合死亡人數、海嘯高度、地震及核災級數等資訊來說明災難的慘烈程度：

一號機組爆炸後，向空中噴出數百公尺高的巨大白色煙柱與蒸氣，周圍地區很快就落下滾滾殘礫。大批直升機、警車、救護車及消防車十二日緊急馳往福島核電廠撤運待命戒備並維持秩序，住在核電廠附近的民眾驚恐逃離，由於加油站大排長龍，每輛車只能配給十公升柴油，一名小女孩乘坐廂型車逃離家園，不斷哭泣。……冒險深入現場的感覺極為恐怖，腳下的地面不斷震動，環繞縣城的主幹道已斷為兩截，通信中斷。飯店投宿困難，飲用水不多，全縣的許多地區如今有如鬼域（陳世欽，2011）。

這類報導著重發生經過的情境描述，透過情境描寫讓閱聽眾產生一種「驚懼」的切身感受。這類報導當然還包括災難所引發其他相關問題之嚴重性的戲劇化報導，如對股災的描繪：

日本宮城縣大地震，今日開盤果然重擊日股。日經 225 指數開盤以大跌 210.26 點開出，且跌幅持續擴大，上午盤中一度下跌超過 500 點，跌幅達 5.4%，創近兩年來最大跌幅，多檔股票開盤甚至無法交易，市場一度傳出，下午將緊急休市，不過，最後仍照常交易，但指數又再探底，大跌超過 650 點，跌幅也超過 6%，並一度來到 9,594 點（周品均等，2011）。

這類型的報導往往能讓閱聽眾直接感受到災難的嚴重性，感同身受的情緒會因此而迸發。當然許多電視媒體中相關影像的播送更具有直接的衝擊效果，在災難剛發生的那幾天電視悲愴影像重覆播放的媒體現象，說明了這類再現的敘事類型在災難剛發生時往往是新聞性最高的文本。

## 二、創造疏離效果的敘事類型

這類的報導文本引導閱聽眾在情緒上不致於太「入戲」，反而提醒閱聽眾要站在客觀審視的角度，以便讓閱聽眾保有批判的空間。這類敘事文本依其敘事方式可進一步區分為以下三種不同的類別：

1. 透過對救災策略的客觀報導及評價，往往可以引導閱聽眾以一種客觀的角度來審視災難中相關單位所採取的行動架構，最常見就是對公部門及民間團體救災狀況的報導及評述：

首相菅直人宣布，居民撤退範圍從廿公里擴大為卅公里，但美國後來宣布，美國僑民原則上禁止進入八十公里範圍，打了日本政府一個大耳光。……後來福島電廠又發生連四爆的嚴重情況，美國也把大使館員及家屬撤到臺灣，日本首相卻只能呼籲民眾「不要慌張，冷靜應對」。……枝野等於是日本政府的新聞官，迄今已舉行至少四十場記者會，但他充其量只是照本宣科，真正被追問核電廠危機的技術問題時，他經常用「必須問專家」來搪塞。……日本首相在這次核災中，什麼大決定也都沒做出來，連對要先灌救哪個反應爐？據說都沒有定論。民眾天天看電視，也不知道核災究竟多嚴重，災害已發生十幾天，人們還是看不到救災的具體方向（陳世昌，2011c）。

當然這類評價正反面都有，例如美聯社就曾提出正面的說法：

菅直人處理東北震災的速度，咸認比一九九五年阪神大地震時的村山富市政府好很多。當時日本政府對於該不該派自衛隊救災猶豫再三；發放國際救援物資速度太慢，物資在倉庫堆積如山；緊急糧食運送也拖拖拉拉，許多災民餓肚子（莊蕙嘉，2011）。

這類評述性的報導引導閱聽眾站在第三者的角度來觀察此次災難事件的發展，因而增加對後續「劇情」發展進行批判及評價的可能性。此外，在這類評價性的報導中，也往往會依閱聽眾有興趣的立場切入，如擴及對閱聽眾所屬政府進行評價：

日本福島核電廠發生輻射及爆炸事件，引發外界關切臺灣核電廠安全，臺電董事長陳貴明指出，臺灣的核電廠與福島電廠不同處，在於存有四萬噸水可緊急降溫，且有較完整的備源發電系統。若有必要，臺電也會考慮日本作法，放棄機組再運轉的可能，引入海水降溫，以人民生命為優先（楊文琪，2011）。

核安演習像演戲？緊鄰核三廠的屏東恆春居民昨天北上向民進黨立委潘孟安陳情指出，他們是去年核三廠核安演習的「臨時演員」，領了一千元「戲酬」配合演出，卻不知演習流程與核災知識。他們還抱怨，每個里都沒有廣播系統，核災時沒廣播，「連什麼時候該吃碘片都不知道！」（曾雅玲，2011）。

2. 透過回溯過去的防範作為以及檢討預防工作的缺憾，也往往能引導閱聽眾採取客觀審視的態度。這種文本乃透過究責的方式來讓閱聽眾產生一種災難情緒上的疏離效果，如以下兩則：

日本對於核電廠可能造成的災害早已採取積極防範的作法，二〇〇七年新潟發生強震之後，日本即將核電廠的抗震標準，建築防震係數由 0.4g（g 為地表重力加速度）提高至 0.6g 以上，並且立即著手結構補強。但遇到這次如此超級大強震，仍是無法防止核電廠受損，輻射可能外洩的災難（蔡榮根，2011）。

這次發生核電危機的日本福島縣第一核電廠和第二核電廠，都由東京電力公司負責運營。這並非福島核電廠首次發生事故。福島第一核電廠一九七八年曾發生「臨界事故」，但一直被隱瞞，至二〇〇七年才公布。東京電力公司當年還承認，從一九七七年起在對所屬三座核電廠總計一百九十九次定期檢查中，數據被竄改廿八次。該公司總裁後來被迫和其他四名資深高層主管一起請辭，為核電廠安全紀錄造假事件負責。東電是日本最大的電力公共事業體。福島第一核電廠已有四十年歷史（聯合報編譯中心，2011a）。

這類的敘事報導能製造出前述希臘悲劇理論中「轉折」及「辨認」的結合效果，也就是讓人看到整個事件由初見端倪到預視被不幸而言中的悲劇發展歷程。這種敘事報導特別容易引發人進行究責的思辯，因此這類報導的政治效應特別大，可以說媒體這類報導常常為政治領域帶來後續的政治風暴。

3. 跨文化的對比觀察也往往提醒閱聽眾作為第三觀察者的客觀角色。如這次日本福島事件發生後，臺灣媒體一度對日本人的冷靜、守秩序有所正面的評價（如下列的報導所示），一直到核災事故一發不可收拾的發展顯露出日本政府的多項缺失後，正面的評價才逐漸告終。

新宿車站前的計程車招呼站，排隊長龍蜿蜒好幾個彎，但是日本人都很有耐性，沒有看到為了插隊而爭得面紅耳赤的景象。……這就是「先進國」日本，即使遇到緊急狀況，還是保持著慣有的笑容與禮節，誰也不會在這個時候起衝突，也沒有人會對著車站的站務員怒言相向。日本人對「災難處理」，其實早已有了一套軟體與硬體準則。……

網路上許多人討論著，日本人即使遇到了大災難，還是保有先進國家的尊嚴（陳世昌，2011a）。

報導敘述中往往伴隨出現的是將閱聽眾所屬國（臺灣）作為對照組的描寫，引導閱聽眾進入另一個觀察角度來進行自我反思，透過採客觀態度的方式來跳脫辨認出災難時所產生的情緒耽溺：

菅首相坐鎮東京，未曾離開東京一步。沒有人認為首相必須親臨災區。大家知道在這個時候怎麼做、做什麼對日本最有利！……在野黨幾乎全部銷聲匿跡了。這是多麼不可思議的事情！如果有人將國內每次發生災難後的報紙、電視畫面和日本這次作個對照，會是強烈的鮮明對比。臺灣、日本的差異在哪裡，一目了然。……這幾天出自災民、受訪者，最常聽到的是「頑張れ！」（加油！）和「ありがとう！」（謝謝！）災民只提出希望獲得什麼援助，需要什麼物質；沒有強烈指責政府的不是或無能。……平常，儘管大家意見分歧，吵吵鬧鬧，但是面對國家遭逢大變動、大災難時，馬上捐棄己見，團結一致，克服困難，這是日本人無形的最大資產，值得驕傲的地方（林水福，2011）。

本文上述所列舉的兩大類意義文本，乃分別以不同的方式導引閱聽眾的觀看角度，創造了閱聽眾對此災難事件真實存在的認知，讓閱聽眾真實感知它的存在。由於災難在本質上與悲劇的屬性相當雷同，若參照亞里斯多德針對悲劇所提的轉折、辨認、苦難三要素劇場理論，可以說這兩類敘事文本特別突顯戲劇當中的「辨認」元素，讓閱聽眾「辨認」出災難存在的切身感知，引發大家悲憤的情緒及批判動力。

## 伍、災難劇碼中「消化方向」的導引

一件災難事件的多元媒體敘事，對閱聽眾來說就如同是一齣劇，在引發出大家悲憤的情緒及批判性的反思時，閱聽眾因而開始試圖尋找面對這災難的態度及方式，亦即尋求可能的「出口」。若依亞里斯多德的悲劇理論，前述的兩類敘事都還不足以完成意義的生產，整個意義的生產還必須有導引閱聽眾尋獲「出口」的消化過程，在這過程中一些可能的情緒消化及認知方向必須被勾勒出來讓觀眾有所參照。由疏離或驚懼促成觀者內在進行意義「出口」的搜尋、試圖從災難中照見一些足以讓情緒得以消化的方向，這類「出口」意味著一種內在昇華；而另一種可能，則是閱聽眾在觀看災難事件後能進行反思，如生產論述或意見的抒發，甚至透過實際的行動來進行參與（代表一種確定性的意義實踐），這類「出口」意味著一種批判式的實踐，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創造了閱聽眾消化反芻的方向。依報導敘事的內容分析，我們發現有這兩類「災難劇碼」，分別提供閱聽眾進行情緒消化及建構意義認知的方向：

### 一、寓意式的劇碼作為情緒出口

針對災難過程中人性溫情面所進行的敘事報導提供了閱聽眾引導自我情緒出口的一種可能性，在此次福島核災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五十位救災壯士的敘事：

「福島五十死士」志願死守廠區抗核，宛如「忠臣藏」赤穗四十七義士的現代版，電影裡的傳奇，發生在真實的日本。……福島第一核電廠災變，廠內有五十位員工留守，冒著生命危險，在現場應變。想像他們在蒸氣、爆炸、大火、輻射等種種危惡的情境下，作最後搏鬥，當然須有奮

不顧身的大義大仁大勇作精神上的支撐，忘卻自我，為了大局。一名留守者傳出話來說：「我不怕死，這是我的職責。」許多人在解釋這些留守者的精神意識。有人說是武士道精神，美聯社即稱這五十人為「現代武士」；此說所見是他們顯現的義勇、報恩、不畏死的武士風範；另有人說是神風特攻隊的「一人／一機／一艦」精神，將自己化作「櫻花機」或「回天魚雷」，而把反應爐當作敵人的母艦。然而，這些解釋，似都不如那一句話來得淺白又透澈：「我不怕死，這是我的職責。」（聯合報編譯中心，2011b）

這類報導將情緒由觀看災變慘烈情狀的悲憤引入另一種出口，上述這類出口由於提供一種意義架構，因此讓人情緒的悲憤得以轉向，在此同時也創造一種內在意義反思的方向感，達到某種程度上亞里斯多德悲劇理論中所說的「昇華」作用。

## 二、行動式的劇碼作為反思性的出口

報導文本中，有許多述說社會中其他人的反思性行動，這類敘事提供了另一種對災難事件進行「消化反芻」的可能方向：

外交部呼籲民眾透過「外交部海外賑災專戶」踴躍捐款，協助日本災後重建……國內社福團體也啟動募款行動，呼籲國人伸出援手。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指出，日本紅十字會已動員十一個負責災情評估、急救、公共衛生與心理支援計畫的災難應變小組，還有卅支醫療小組前往災區，準備進行醫療救護及後續賑濟物資調配。截至昨天下午五點，紅十字會總計收到超過兩千六百筆捐款，共募得五百多萬元。……臺灣世界展望會表示，日本世界展望會

工作人員昨天已進入災區，初估第一個月救援經費達五十萬美元。臺灣世界展望會將透過「飢餓三十」行動，募集一千萬元臺幣。……紅十字會成立尋人服務專線，旅日華僑的家屬及在臺日僑可撥打專線尋人，電話：〇二-二三六二八二三二轉二〇五。……紅十字國際委員會與日本紅十字會成立尋人網絡，民眾可上網查詢目前登錄名單或失聯者資訊，災區民眾也可登錄資訊，透過平臺與親友取得聯繫（蔡永彬等，2011）。

這類相應活動的報導提供閱聽眾思考後續如何因應的行動架構，如捐款、參與救災活動等。這種行動架構呈現的就是一種意義框架，這類反思性行動的敘事文本可算是某些行動單位意義建構的媒體再現。當然，這類意義架構既然是反思性的，自然也會促使閱聽眾反思自己所處的社會環境，進而採取相關的行動架構：

日本福島核災事件，讓位處核四旁的宜蘭民眾憂心忡忡，宜蘭縣議會民進黨團與宜蘭縣環保聯盟理事長張捷隆，昨天舉行記者會，呼籲政府暫緩核四廠運轉，找其他替代能源，將於三月二十日到臺北參加反核災大遊行。……宜蘭縣環保聯盟理事長張捷隆說，全國環保聯盟和各分會前天在臺北召開會議，決定三月二十日在臺北舉行「我愛臺灣，不要核災」大遊行，下午一點三十分在自由廣場集合，「宜蘭在核四災變的範圍裡，更要參加。」……縣議員江聰淵指出，核四廠至少有三條斷層經過，鄰近還有龜山島海域的活火山地帶，這些事實都證明無法迴避地震及近海海嘯威脅，尤其近來的地震震度越來越大，靠海的核四電廠更是危險，不應該冒然運轉（吳淑君，2011）。

相關行動者（如政府、民間團體、演藝人員）的作為，例如他們彼此之間的攻防及合作，經類似劇本撰寫的編排，提供了媒體敘事更多不同的題材，這間接產生的效應是，閱聽眾在找尋出口時得以因此而有更多不同的意義思考方向及參考座標。閱聽眾在觀看不同行動架構的過程中，可能引發自身參與其中（如透過捐款），這是一種塑造疏離化反思效果後所產生的反思性參與。其中上演劇碼的行動者，當然也包括了跨國的行動單位，如德國政府在福島核災之後確定了爭議多時的廢核政策，這些跨國所引發的行動及決策架構也可以是閱聽眾參照意義生產時的重要基礎。

所謂的「出口」不必然是那些一定要能解決災難問題的方案，對某些人來說，「出口」可以只是一種情緒上的撫慰、一種因應方案、預防方案、或甚至只是行政過程上的共識生產，若能讓閱聽眾對某種說法或觀察角度產生認同，都足以被視為是一種抒發的出口。重要的是它提供了閱聽眾內在意義建構的一個方向，能讓閱聽眾自己產生一種「與之以對」的可能性，如同以下這篇讀者投書的文本片斷：

日本政府的脆弱，在這次危機中表露無遺。核電災害，日本向美國求救，要冷卻危在旦夕的機組，但從空中噴水，似乎僅是杯水車薪。這讓人想起美國電影「超人」。電影中，「超人」緊急冷凍湖水，運到核電廠上空往下丟，解除了危機。但真實社會裡，超人並不存在；要運用核電，沒有充分控制技術是行不通的。日本的失控，給臺灣核電廠很大的省思（陳世昌，2011b）。

這類無解決方案的表態代表一種內在認知態度的建立，對投書者而言已構成一種內在「出口」的建構。這類民意論壇的意見陳述多是

在災難事件發生的幾天後才陸續出現，可說是在「觀看」了公部門及民間團體的行動展演之後所衍生的「觀後感言」。他的結論或許不足以代表整個社會的共識，也不會是能徹底解決災難問題的方案，但他的投書行動及內在反思性的思考對他個人而言，（至少暫時）足以是一種結論、成為一種出口。

## 陸、由多元災難「敘事」交織成的戲劇

媒體的災難敘事報導透露了一個社會如何面對災難及因應災難的過程，不論我們將這些敘事報導視為是批判性的報導或因商業經營壓力所生產的文本，它們都是對象針對性相當高的文本，它們鎖定閱聽眾為文本展演的對象。因此當它們喚起閱聽眾對災難不同面向及不同程度的關注時，這些關注往往能召喚出更多社會中的因應行動及作為，這些行動及作為進而反過來豐富了更多媒體生產敘事的題材。當閱聽眾的參與行動反過來成為媒體再現的議題時，相關行動個體或單位也就躍升為演員，他們的行動架構便成為媒體中所報導的「事件」，如前述例舉之反核社運團體所採取的作為。這些行動架構一方面是行動者尋求「出口」的一種可能方式，另一方面這些行動架構被媒體再現的同時也豐富了閱聽眾的思考方向。同樣的，當讀者藉由投書表達自己的看法時，投書者便躍升成為劇中的一個角色，在媒體中提供出一種意義向度。

在災難事件的媒體再現中，真正編劇的人不只是寫稿的記者，其他的行動實踐者、投書者也同時提供了題材，讓更多可能的「出口」透過媒體來被呈現。不同的災難敘事提供了政治上相關行動者進行行動選擇的參照點，這種政治戲碼的安排不僅在公部門中進行，許多民間團體也會生產相關的政治戲碼，例如廢核議題在這次福島事件爆發之後，也成為許多國家的民間團體編排政治戲碼的契

機。災難透過媒體片斷的再現，讓許多領域都有了創造行動劇碼的可能。

就此而言，災難敘事文本的呈現有相當高的延展性及再生產性，是一齣開放的、待完成的劇，這齣劇是由多元敘事背後所體現的不同展演行動力所構成的意義生產整體。不同敘事內容背後所體現的展演行動力表現的是不同論述間的爭辯，同時也因而展現出戲劇的張力。由戲劇理論的角度，我們可以在媒體災難敘事的多元性中找到它們之間的相關性，並且可以將不同的災難敘事放在同一個架構中審視：一個災難敘事背後的不同展演行動者（如同演員），有可能引發閱聽大眾（如同觀眾）中的某些成員進行進一步的展演行動來與之對話因而成為演員，這將進而引發出更多不同的災難敘事被呈現在同一個社會中，而這些不同的災難敘事共同交織成一個**戲劇整體**。

## 柒、媒體成為災難風險的製造者？

福島核災發生後，從多元媒體災難敘事所交織構成的劇碼中，我們發現劇中存在著戲分不均的現象，一些聲音或由於論述內涵不具「主流特質」而被消音，或由於發聲者的社會地位沒有新聞性而不足以躍上版面，正如一般戲劇中的常態，總存在著有戲分「強勢／弱勢」、「主角／配角」的差異。分析中發現非科學及非政策管理的其他意義文本在媒體報導中相對是弱勢的，福島核災的事件中就有一鮮明的案例：當二〇一一年日本福島核災發生之時，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曾被日本媒體問到對此次強震災難的感想，他語出驚人地提出天譴說，他認為此次的強震代表著「天譴」，海嘯可以洗清日本人的私慾，日本人應接受天災作為反省。但在他提出天譴說

後，馬上被日本社會輿論圍剿。<sup>1</sup> 這件災難事件中的插曲顯示這種將災變進行宗教性的文化詮釋在現代並不是不存在，但卻有相當高的正當性危機。

針對不同的災難，宗教團體也確實時常有宗教的詮釋，並展演不同的行動劇碼，但這些聲音在傳播媒體中往往被相對地忽視。如臺灣在二〇〇三年 SARS 期間，有鑑於當時人心惶惶，臺南市開基武廟就曾因此而舉行王醮科儀來除煞，但一般的新聞處理並沒有給予相當的關注。如果說媒體中存在著論述權力，可以確知目前論述災難的權力性格是相當具科技治理及政治管理色彩的。例如雖然不同的環保團體分別有不同的訴求主張，但在媒體中符合科技治理、政策改革訴求的聲音，往往比一些崇尚自然訴求為主軸的軟性社會團體的聲音來得更具有正當性。非科學及非政策治理的敘事戲分相當少的事實，充分顯示出媒體在災難報導中進行意義生產的正當性基礎是十足科技治理及政治管理式的。

除了前述論述權力所帶來的戲分差異外，媒體場域的市場化也影響著劇碼的走向。許多文獻都曾指出媒體市場化所產生的弊端，如 Habermas 的分析就指出媒體的市場化發展讓歐洲本來有的文化批判的公眾，逐漸轉變成沒有理性溝通能力之文化消費的公眾 (Habermas, 2003: 213-228)。災難報導中，由於行動性的事件往往比理念式的溝通來得更具有新聞性，因此促成了相關社運團體在宣揚及推廣理念的過程中，不得不以「創造行動事件」的方式來進行，如此才能搏得版面而躍升為演員。同樣的，媒體的報導也因顧及收視率及閱報率等市場競爭的因素，致使報導內容特別容易從聳動及有即時新聞性的角度切入。

<sup>1</sup> 在面對記者的質疑時，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轉而有點防衛地解釋說：「我說的天譴是針對日本，這其實是一種去接受天災，當做反省的一種態度。」(林秉儀，2011)

在這意義上可以說媒體業界特殊的敘事生產機制及市場競爭機制這兩個因素關鍵地決定了「演員／閱聽眾」的界線，甚至有可能因此產生 Bourdieu 所說的「通敵合謀」機制的現象（Bourdieu, 2002: 89-98）：媒體在新聞性考量的把關下，選擇性地與一些行動者「共謀」，生產具高度展演性的敘事，而公部門的決策在此共謀現象的背景下，將不會是「就事論事」而是在顧及閱聽人觀感的前提下進行，這促成劇本所產生的政治效應往往成為「展演的」而非「議事的」，這是現代風險治理的文化性格。也就是說，災難的相關決策因媒體的存在將會是充滿政治展演考量的決策，這是現代民主社會災難決策的治理性必然擁有的特質。就這意義而言，媒體不僅為現代社會中提供了生產意義架構的劇本，也可能是社會中另一種風險的來源。

此外，筆者還發現一項值得關注的現象，亦即針對此次福島核災，平面媒體中民意論壇的發言者幾乎都是一些專家及文化人，一般民眾的觀點極少被顧及，而且這些具論述能力的人所呈現的觀點多是反思性特質的思維。這現象似乎意味著在這類災變中能生產意義架構的編劇者往往需要有一定的專業能力與文化資本。這突顯了媒體這個看似近乎完全開放的領域，發言權仍存在著不對等的現象。由災難報導的戲劇分析，我們發現媒體運作機制有可能造成權力性「戲分不均」甚至衍生出權力結構再製而強化了災難風險分配不平等的正義問題，不對等的論述權力足以影響相關公共決策，強化災難風險分配的不平等。<sup>2</sup>

---

<sup>2</sup> 德國社會學家 Ulrich Beck 曾以風險分配的問題說明現代社會的特徵，並藉以區隔過去財產分配的階級問題（Beck, 1992）。

## 捌、多元媒體災難敘事與社會「共在感」的建構

媒體所建構的災難敘事與一般戲劇文本中的敘事結構不同的是，媒體的災難敘事文本是多元的，不同的報導會由不同的角度生產不同的敘事文本，閱聽眾乃是從多元的文本中拼湊出對同一災難事件的印象及意義認知，如同馬賽克式地拼貼出對災難事件的圖像，而不同的文本像是積木中的片塊，提供閱聽眾選擇性地組裝成一個意義架構。這類馬賽克式的戲劇文本事實上給予了閱聽眾更多元的詮釋空間，更多元的意義建構，在這層次上它與一般戲劇文本並不相同。

但從戲劇理論的分析中，我們發現在媒體多元災難敘事所交織成的戲劇展演中，儘管戲碼紛雜，卻也真的創造出一些共同的元素，例如其中就隱藏著社會「公共性」及「環境觀」的意義建構。「公共性」的意義建構與認同問題相關，涉及閱聽眾集體感知的強化；而「環境觀」的意義建構則是環境態度（環境美學）的建構，涉及人們面對大自然的生活態度等問題。在前述文本分類的分析中，涉及反思性的行動劇碼，其內容主要涉及集體行動及公共政策的改革，這些行動架構背後都隱含有一種集體界限的建構機制，亦即一種我群的劃界。尤其在這次福島核災的報導中更能鮮明的看出集體劃界的內涵，因為臺灣不是災難發生地，因而此次災難所引發的反思性行動的我群範圍，很清楚地只界定在臺灣本身的公共政策。這是在一個有清楚我群範圍界定下的公共性反思，反思的過程等於同時強化了相關公共性的認知，以及我群界線的認知。

另一方面，有關環境態度的建構則是跨社會劃界的限制，將「我群」的理解放大為與「全人類」有關的理念，因此環保團體的抗議活動得以跨界地與日本持相同主張的團體合作。這同時顯示了

災難事件所引發之兩類不同社會建構的內涵：(1) 它會激化集體認同，當預防或因應措施需要集體行動架構時，集體認同的劃界活動會因而被強化；(2) 它會產生某類得以跨界傳散的意義建構（如環境觀），就這意義而言，相關的敘事結構是具有跨地域的普遍性意涵。這看似同時是「劃界」及「跨界」的矛盾現象，其實意味著災難敘事同時促發了多重論述，這些不同的論述分別在不同層次進行不同的意義建構，而非本質內在矛盾的現象。

災難的特殊性在於它能喚起共同體意識，讓人產生對集體共識的記憶。它的不可預測性讓它成為跨社群、跨社團、甚至跨區域及國家的「想像基礎」。由於結構性的風險無法因單一行動者的行動選擇而被消除，因而在理性思維上就有集體合作的需求，這創造了一種公共性的基礎；此外，在情緒上，災難令人驚懼的特質，也同樣創造了閱聽眾情感上相互依賴的需要。也就是說，在理性及情感上，災難都可以創造出一種認同跨群、跨區公共性的認知。因此我們可以說，媒體的災難報導是現代社會中少數還能創造集體感知的重要機制之一，但它的基礎是物質性的，涉及的是風險治理的物理學，它引發出不同的消化「出口」及論述，這些論述彼此在媒體上相互競合、對話，因而產生一種共同問題意識的想像讓彼此的對話有所交集，它的物理性促使它在引發論述的強制性上是跨族群、性別及階級的。這個交集（風險感知）創造出了現代社會公共性的一項重要內涵，在這公共性的基礎上，不同的族群、階級等社會特徵的人，彼此之間可因此而發展出「共同體」的認知。

另一方面，我們可以說災難事件被建構的同時，另一種抗拒共識、抗拒集體治理的壓力也同時並存，當媒體的災難報導將「意義片斷」放入市場競爭運作的同時，意味著一個社會無法再單純以政治過程來定調災難。意義的生產成為閱聽人自己的選擇，社會中將

很難生產出意義層次上的同質共識。其中的弔詭在於，當大家都被喚起一種共同體意識的需求時，媒體的多元文本運作卻讓社會中所生產出的共同體意識無法有單一的實質內涵。一個事件各自表述的現象成為媒體社會中的常態與必然，多元文本宣告了單一共識的不可能性，也同時說明放下爭議凝聚共識的天真與荒謬。

我們對災難的認識無可避免的必須透過媒體敘事文本的生產與再生產，在彼此的展演中不斷地進行溝通，而多元之災難敘事所交織成的「災難劇」創造了社會中（包括參與演出的演員社群及閱聽眾）一種「共在感」的想像，亦即創造了一個具「不確定性」特質的公共性想像，但這卻未必終能創造社會中確定的因應方式及態度上的集體共識。從災難敘事的研究中，我們所獲得的啟發是：現代社會中的集體共識不會是以共識內容的一致性來呈現，而是以共同的事件經歷（包括身體物理性或文本閱聽的經歷）所產生的「共在感」為基礎，而這共在的基礎即是建立在偶發的不確定性事件（如災難）及多元詮釋的意義建構活動之上。

## 參考書目

### 中文書目

- 吳淑君（2011）。〈反核四！宜蘭人要到臺北大遊行〉。聯合報 2011 年 3 月 18 日 B1 版。
- 周品均、嚴雅芳、楊雅婷等（2011）。〈股災 日股狂瀉 亞股怯〉。聯合晚報 2011 年 3 月 14 日 A1 版。
- 林水福（2011）。〈日本將會再一次脫胎換骨〉。聯合報 2011 年 3 月 28 日 D3 版。
- 莊蕙嘉（2011）。〈福島核一廠連四爆 菅直人怒飆〉。聯合報 2011 年 3 月 16 日 A3 版。
- 陳世昌（2011a）。〈災後井然有序 日本贏得尊敬〉。聯合報 2011 年 3 月 13 日 A3 版。
- （2011b）。〈神話破功 超人在哪裡？〉。聯合報 2011 年 3 月 18 日 A23 版。
- （2011c）。〈都 11 天了 菅直人到底有什麼核災政策？〉。聯合報 2011 年 3 月 22 日 A3 版。
- 陳世欽（2011）。〈驚恐逃難 每車只給十公升油〉。聯合報 2011 年 3 月 14 日 A4 版。
- 曾雅玲（2011）。〈領千元裝昏核災全不懂 核安演習當成演戲？〉。聯合報 2011 年 3 月 19 日 A6 版。
- 楊文琪（2011）。〈急應變 總統召開國安會議〉。經濟日報 2011 年 3 月 14 日 A4 版。
- 蔡永彬、曾懿晴、張嘉芳、甘育璋、王昭月、黃宏璣等（2011）。〈臺灣捐一億 社福團體急送暖〉。聯合報 2011 年 3 月 13 日 A8 版。

- 蔡榮根 (2011)。〈臺灣核電廠不如日本耐震〉。中國時報 2011 年 3 月 13 日 A15 版。
- 聯合報編譯中心 (2011a)。〈安全紀錄造假 福島核電廠 曾隱瞞事故〉。聯合報 2011 年 3 月 13 日 A3 版。
- (2011b)。〈這是我的職責〉。聯合報 2011 年 3 月 18 日 A2 版。

### 中文譯著

- 鄭芳雄 (2005)。〈導言〉，收入布雷希特 (Bertolt Brecht)，《布雷希特戲劇：四川好人、高加索灰闌記》，彭鏡禧、鄭芳雄合譯，頁 3-53。臺北：聯經。
- Bourdieu, Pierre (2002)。《布赫迪厄論電視》，林志明譯。臺北：麥田。
- Habermas, Juergen (2003)。《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曹衛東等譯。臺北：聯經。
- Lévi-Strauss, Claude (1991)。《結構人類學》，陳曉禾、黃錫光譯。北京：文化藝術。
- (2001)。《神話與意義》，楊德睿譯。臺北：麥田。

### 英文書目

- Aristotle (1920). *Aristotle on the Art of Poet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audrillard, Jean (1994).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Michiga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Beck, Ulrich (1992). *Risk Society: Toward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 Bruner, Edward M. (1986). Ethnography as Narrative. In Victor Turner (Ed.), *The Anthropology of Experience* (pp. 139-158).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Davis, Floyd James (1991). *Who is Black? One Nation's Definition*.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 Doja, Albert (2008). Claude Lévi-Stauss at His Centennial: Toward a Future Anthropology.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5, 7-8: 321-340.
- Hastrup, Kirsten (1998). Theatre as a Site of Passage: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Magic of Acting. In Felicia Hughes-Freeland (Ed.), *Ritual, Performance, Media* (pp. 29-45).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Louw, Eric (2005). New Media: New Politics? New Identity. In Eric Louw, *The Media and Political Process* (pp. 118-140). London: University of Sunderland.
- Lyotard, Jean François (1984).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Meyer, Thomas (2002). *Media Democracy: How the Media Colonize Politics*. Oxford: Polity Press.
- Riessman, Catherine K. (1993). *Narrative Analysis*. London: Sage.
- Scammell, Margaret (2003). Citizen Consumer: Towards a New Marketing of Politics? In John Corner (Ed.), *Media and the Restyling of Politics* (pp. 117-136). London: Sage Publishing.
- Schieffelin, Edward L. (1998). Problematizing Performance. In Felicia Hughes-Freeland (Ed.), *Ritual, Performance, Media* (pp. 194-209).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Somers, Margaret R. & Gloria D. Gibson (1994). Reclaiming the Epistemological “Other” : Narrative and the Social Constitution of Identity. In Craig Calhoun (Ed.), *Soci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pp.37-99). Oxford and Cambridge: Blackwell.
- Storey, John (2003).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Study of Popular Culture*.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 Taylor, Charles (1989). *Sources of the Self*.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Turner, Victor (1966). *The Ritual Process: 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 (1974). *Dramas, Fields, and Metaphors: Symbolic Action in Human Society*.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82). *From Ritual to Theatre: The Human Seriousness of Play*. New York: PAJ Publications.

## 電子資料

- 林秉儀 (2011)。〈「強震是天譴」 石原失言激怒日本人〉。TVBS-N 網路新聞，網址：[http://www.tvbs.com.tw/news/news\\_list.asp?no=jimmyliu220110315124047](http://www.tvbs.com.tw/news/news_list.asp?no=jimmyliu220110315124047)。點閱日期：2012年9月10日。

##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Meaning in Disaster Narratives of Mass Media: Dramaturgical Analysis of Fukushima Nuclear Disaster in Japan

Wei-Hsian Chi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pplied Sociology,  
Nan-Hua University

Disaster narratives of mass media essentially influence the ways of social communication and, thus, the public attitude toward disasters. This means that disaster narratives represent not only messages, but also social actions which construct a social meaning frame for understanding the disasters. Besides, these narratives of mass media could evoke other social actions, like those of some civil organizations or the public donation etc. These reflexively create more issues for media reports. Regarding the reflexive characteristic of disaster narratives, the theory of social dramaturgy provides us a good standpoint to understand how we could face the disasters and how we shall understand them.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Fukushima Nuclear Disaster in 2011 and analyses the related reports in the Taiwanese newspapers. By dramaturgical theory, I shall show how the various disaster narratives form a social drama, and how they construct a social meaning frame. It shows that disaster is one of a few issues which promote the collective existence of “*communitas*”.

**Keywords:** Disaster, Narrative, Dramaturgical Analysis, Fukushima Nuclear Disaster, Mass Media